

YE 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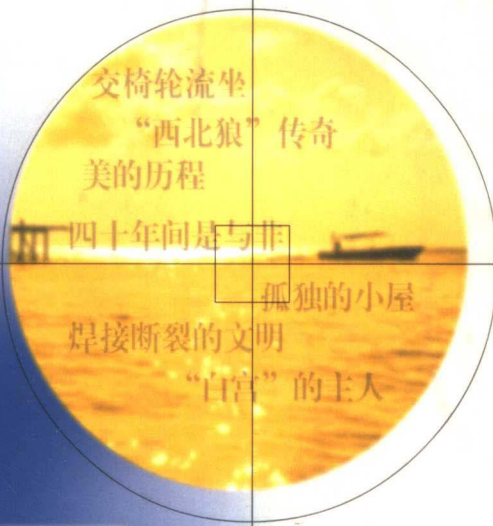
支点 —

叶辉 新闻人物作品集

叶辉 著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约瑟夫·普利策



光明日报 出版社

支 点

——叶辉新闻人物作品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支点:叶辉新闻人物作品集/叶辉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ISBN 7-80145-807-9

I. 支… II. 叶… III. 人物-访问记-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035 号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8243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20 千字

2003 年 11 月 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807-9/G

定价:20.00 元

序

樊云芳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新闻记者，这四十来篇新闻人物采访录，是他十多年来记者生涯的结晶。作为同行，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读这本书，感觉里面精芜并存，良莠混杂。因此，在动手写这个小序之前，我建议叶辉把里面少量的“芜”与“莠”去除，光留下精品奉献给读者；或者，把“芜”与“莠”改写提炼一下——这似乎不用花很大工夫——再与读者见面。

叶辉在电话里沉吟片刻，答：那都是些已发表了的作品，改写似乎不妥。有许多篇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自己也很不满意，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发掘的方向不对，把被采访人物最有价值的一面忽略了，有的是因为求面面俱到，结果反把最精彩的东西淹没了。“这样吧，”他说：“你就照直写，实事求是。序不是广告，不应该光是溢美之词。”

这态度令我意外，也令我欣然。这就是叶辉，这就是那个从小木匠苦读成大学生，从最不起眼的小记者变成了光明日报大牌记者的叶辉。

说实话，这本书里的多数文章令我不禁喝彩，令我爱不释手，更令我长久地思索。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新闻，而且是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新闻。譬如说《财政奇人翁礼华》，用短短的一千多字，描述出了一位活生生的省财政厅厅长、省地方税务局局长的鲜明形



象,以及他“四两拨千斤”的理财思路,以及这条思路在整个浙江省取得的惊人奇效。

而在这之前,叶辉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发表于1998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的一版头条,题为《浙江省财政改革“四两拨千斤”》,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李岚清副总理做了批示;国务院体改办主任刘仲藜专程来浙江省做调查,听取意见,结果是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好评如潮。另一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第一期《人物》杂志,题为《阿基米德支点》,用记者与翁礼华问答的方式,记录了“两保两挂”政策(浙江省财政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出台的背景与经过。

由于光明日报报道的重点历来是科技、教育、文化,多数光明日报记者不熟悉经济工作,在版面上很少能见到有分量的经济报道,而叶辉偏偏能先于其他新闻单位的同行,抓住了这样有分量、有影响的“活鱼”,且文字生动、幽默、简洁,把中国财政制度的积弊、政策出台的复杂经过,枯燥乏味的数字,讲解得通俗易懂、清晰明了,而且有趣可读,真令人羡慕煞。

又譬如《四十年间是与非》一文,是叶辉对杜导正的著作《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的读后感。从一本书中读出一条极有价值的大新闻,因为“能以如此大的勇气,反思自己一生的经历,无情剖析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上的是非功过,在今日之中国新闻界,杜导正恐怕是第一人”。此文在《传记文学》发表后,马上被香港报纸转载。

《落榜偏才终圆大学梦》、《一篇未能发出的报道》、《职责和人情——一篇久拖未发的批评报道》、《一个学术新秀的沉沦——张××是怎样走上剽窃之路的》……均发人深思,提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创立者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



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我认为叶辉就是这样的—个新闻记者。

但无须讳言,本书中也有些文章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还算有趣,但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它们出自叶辉这样一个大牌新闻记者之手,没有体现出他的水平。还有个别篇,就连有趣也谈不上,就像现在报纸上通常的好人好事表扬,淡得像白开水,读后没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其原因,叶辉自己已经分析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2003年5月6日



目 录

序//樊云芳	1
--------------	---

社会名流

四十年间是与非

——读杜导正《是与非》有感	1
---------------------	---

悠悠民生情

——记杭州民生药厂厂长郑筱萸	10
----------------------	----

交椅轮流坐

——丁炳昌樊云芳夫妇记趣	34
--------------------	----

媒体英雄

“西北狼”传奇

——光明日报驻内蒙记者杜弋鹏素描	45
------------------------	----

铁肩辣手

——记文汇报记者万润龙	59
-------------------	----

三湘笔侠

——记光明日报驻湖南记者唐湘岳	75
-----------------------	----

真正的人民记者

——陈宗立介入杨小民杀人案并促使改判过程追述	87
------------------------------	----

知识精英

阿基米德支点

——翁礼华的理财新思路	98
-------------------	----



财政奇人翁礼华

-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翁礼华素描 109

美的历程

- 把工笔画带出死胡同的徐启雄 112

焊接断裂的文明

- 叶宏明恢复官窑哥窑的艰难历程 122

郦学大家

- 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 132

孤独的小屋

- 记瑞安市农科所农艺师朱伯衡 143

面对死神创立的新学科

- 记灰学创始人孙万鹏 153

落榜偏才终圆大学梦

- 记崔利静 166

开展览学大门的人

- 潘杰与钱学森的交往 175

商场战将

鱼跃龙门

- 记东昌集团董事长钱云冰 185

太阳城的主人

- 记攀钢总经理赵忠玉 199

“白宫”的主人

- 记茉织华集团总裁李勤夫 211

一个人和一个新兴产业

- 记周晓光和她的新光饰品公司 224

磁性企业家

- 记横店东磁集团总经理何时金 238

“共产主义人才战略”

- 记新昌制药厂厂长李春波 243



新闻人物

寻找生命的闪光点	
——记赵家启	251
流浪摄影家	
——记薛华克	255
特殊的校长	
——记清泉武校校长周清泉	259
啼血的杜鹃	
——记金永玲艺术团团长金永玲	262
“横店市长”	
——记横店集团董事局主席徐文荣	265
宁波的投资环境	
——港商王铭和启新高尔夫球场的故事	269

批评与问题

除霸记	
——记高育厅	272
一个学术新秀的沉沦	
——张×是怎样走上剽窃之路的	281
职责和人情	
——关于一篇久拖未发的批评报道	289
一篇未能发出的报道	297



四十年间是与非

——读杜导正《是与非》有感

能以如此大的勇气,反思自己一生的经历,无情剖析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上的是非功过,在今日之中国新闻界,杜导正恐怕是第一人。

不经意间翻出了1991年出版的《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一书,打开扉页,作者的题词赫然在目:“奉上我出版的一部拙作。自序、编前、编后语、小传,我有些感时的话。读后有意见告我。杜导正。”

杜导正乃中国新闻界知名老新闻工作者,他供职新华社30余年,1982年到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1987年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是与非》便是这位老记者对自己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反思,他把自己各个历史时期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稿件不作删改、如实地重新刊发出来,加上编前或编后语,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过去的历史,对自己的错误之作做无情的批判。像他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历史上的功过,这样的人在中国实在太少了。



我是到光明日报后才开始认识并熟悉老杜的。

杜导正其人

1983年6月,我从杭州大学中文系专修班毕业。经历半年多的折腾,终于落实了工作单位:光明日报。从“右派儿子”到光明日报记者,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我是怀着万分欣喜的心情迎接命运变化的。1984年2月12日,我正式到光明日报报到并参加全国记者会。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永安路,我找到了光明日报。在二楼走廊上,我迎面遇到一个清瘦的小老头。他头发稀疏,头顶微秃,浓黑的眉毛,嘴巴张合间露出了一颗大门牙,他穿着一双圆口布鞋——那种农村里才有的布鞋。这是一个很土很土的小老头,要是蹲在农村的墙根,绝没有人会认为他不是老农民。

“请问记者部在哪里?”我向他问路。

“老农民”目光刷地向我瞥来,我这才发现,他的眼光又黑又亮,甚至逼人。

“新来的?”他问。我忙点头。“跟我来!”“老农民”用不容分说的口吻命令道。说罢,他迈着急促的小碎步,“嗒嗒嗒”向走廊另一头走去,而后指着一扇门朝我点点头,转身回头走去——原来他是专门带我过来的。

呵,光明日报的人真好!

第二天,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召开。走进会场,我蓦地愣住——主席台上,“老农民”端坐中间,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

这是杜总编辑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一个好的印象。

杜导正是1982年3月到光明日报的,那次记者会是杜导正第一次与全体地方记者见面。他在会上说:“我和你们是第一次见面。刚才有些同志叫我‘杜总’或‘总编辑’,这不好。我叫杜导正,你们一律叫我老杜!再叫我的职务,我不会答应的!”

我又是一愣。在地方尤其是在基层,对领导干部的称呼几乎都称职务,人们惟恐对领导不恭,副职的往往去掉前面的“副”字,久而久之,副职领导前面的“副”字就像阿Q头上的疤,不能触及,



并渐渐成为一种忌讳,若有人不知好歹触摸这块疤,不但领导本人不高兴,别人也会认为不合时宜。而老杜呢,有了这么高的职务,却让别人忽略他的职务。他的这一态度使我对这位新闻界老前辈的印象更深了一层。那时我刚参加工作,老杜“一律不能叫职务”的教导印象太深,以至于误认为地方官员也希望别人称其老某或某同志,结果呢,不经意间竟得罪了一些官员,此是后话。

此后便有了没上路前艰难得几乎要打退堂鼓的大半年——我写不出新闻,写出的稿子一篇篇被枪毙,我几乎想离开新闻队伍。毕竟,没读过中学,我的文化基础实在太差。

脱胎换骨一年后,我终于走出困境。此后便是猛发稿的一年多。

1986年9月,我突然接到通知:参加光明日报社访问朝鲜代表团。当时驻地记者出国访问还很少,而几乎作为一种待遇的出国怎么会轮到我这个进报社才2年多的年轻记者?此后方知,当报社外事办公室把出国名单报给老杜时,他拿起笔划掉了一个名字,却把我的名字写上了。这使我非常感动。这是老杜对年轻记者的爱护和期望啊。此时我对老杜的感情已从尊敬发展到感激。

老杜、陕西记者站站长刘炳奇、山西记者站站长梁衡,加上翻译,我们一行5人开始了愉快的访朝之旅。在访朝的半个月中,我进一步了解了老杜的脾性。他是个非常可爱的瘦老头,真诚,直言快语,活泼,有时甚至是顽皮,非常喜欢开玩笑。一次吃饭,席间,服务员给每人端上一杯清澈的白水,我们这些土老冒不知道这水是干么的,我看到老杜的目光偷偷地、暧昧地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地瞄了瞄大家,我们中的一位,拿起水喝了一口。这时我发现,老杜正偷着乐呢。他喝进一口水,故意含在口中叽咕叽咕地漱口,后又吐回杯里。“你们比我还土,这是漱口水啊!漱口水味道怎样?哈哈!”老杜终于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老杜的幽默还表现在常拿自己开涮。他非常得意地讲起自己的爱情故事。他妻子出身名门,当年在晋察冀根据地是出名的美女,追求的人很多。他说:“你们看,就我这副模样,怎么配得上她!可最后还是被我追上了!”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幽默的老杜出身贫寒,在党和农民的养育下长大,抗日战争时在根据地做农民工作,解放战争时与穿了军装的农民日夜滚在

一起。直到当了光明日报这样大报的总编辑，他还时时不忘农民，经常深入农村采访。在光明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本报记者杜导正报道”的字样。他到晋北农村调查，发现当地群众生活很苦，当地县委书记设宴请他，还摆上了酒。饭前老杜让秘书几次告诉那位书记决不可摆酒，书记也是出于敬重，仍摆上了酒，老杜不顾主人的面子，当场拂袖而去，弄得那位书记下不了台。还有一次，他在下乡调查中，当地县委书记专门为他在礼堂安排了歌舞团演出，老杜勃然大怒，说：“这不是旧社会唱堂会吗？共产党还搞这一套！”老杜罢宴、罢听堂会曾在新闻界流传一时。

1987年，老杜调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从此我们联系少了。1991年，我参加一个全国会议，那天刚进人民大会堂，就听老远有人在喊：“小叶子，小叶子！”却是老杜。

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他送了我《是与非》这本书。

40 年间是与非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本该避免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折腾一次连着一次，在一次次运动宣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又一次次甄别平反，为蒙冤者昭雪。在这些运动中，新闻总体上说无不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穆青同志说的：“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工作生涯就是他的政治生涯。”这句话说得很对。在那个时代，记者是绝对无法逃离政治的。

《是与非》收录了老杜从40年代到80年代近50年间发表的新闻作品44篇，新闻业务文章12篇，外加一篇数万言的自传。44篇新闻作品中，有16篇加了编前编后语，“坦诚地剖析老记者的失败与教训”，“由于时过境迁，身入暮年，由我们这些老记者自己来弥补昔日的过失怕难做到了。但记者的历史是延续的，我们的事业将由年轻一辈的记者加以继承。而年轻一辈的记者们总是要重犯一些类似老记者们所犯的错误（《自序》）。”

为了不使后人再犯他那个时代同样的错误，他宁可把自己的伤疤展现出来，在众目睽睽中撒上盐巴！他宁可让自己在众人面前蒙羞，而让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汲取教训！老杜用心是很苦的。

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新闻界领导干部，老杜是紧



跟的，当然也不许不紧跟。“就我个人来说，对于所有这些运动，我都是紧跟的，尽责尽力地予以宣传。上边正确我就跟着正确，上边错误我就跟着错误”。“1957年反右派，我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我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先划的两个人，平时有些骄傲，我给人家上纲到右派已经很不对了，后划的两个人，各方面都挺好，我就下不了手，不愿意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自传》）。”

《他离不开警察》、《麻袋包下》写的是反右期间广东群众批斗民主人士、右派罗翼群的情景。他写了“三四个整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做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我感到内疚。”

大跃进是一个煽动整个民族狂热的政治经济运动，老杜在这个运动中写了不少稿件，特别是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广东省农村宣布“放开肚皮”一日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老杜编辑《是与非》时，为了把这篇稿件找出来，他四处查寻，还发动身边的人一起找。对这样一篇“在当时产生很大很坏影响的报道”，对这样一篇会给自己历史蒙上污点的稿件，他是非找出来不可。后来实在找不到，他就摘了几段当时他写给新华总社的报告，“以证明此事”，编入此书。他在编前语中说：“这条新闻是由我采写，经新华总社播发……它成为当时噪动一时的全国性口号。这完全是浮夸虚报头脑发热的产物，助长了1959、1960年遍及农村的饥荒。我作为记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发表在1959年新华社全国发行的内部刊物上《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广东省反瞒产挖出黑粮28亿斤》两文也是老杜认为产生严重影响的两篇报道，老杜在文前加了编前语，他急于要把它放在前面，让读者读正文前就能了解自己的错误。《瞒产》一文“助长了干部的主观主义错误，助长了‘左’的错误，使人民吃了更大的苦头”，“我头脑热，很盲目又很自信，没有深入到基层去真正了解实情，就根据上面的这些材料，写了这样的东西，实在是有害的”。

古人立传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于“文革”中的错

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老杜却不避讳。“文革”前,他是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中自然难逃惨遭迫害的结果。被“解放”后他担任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此时已是“文革”中后期,他同样犯了“紧跟”的错误,譬如他写的《广东省委紧急部署批林批孔》这份内参发表后,“四人帮”控制下的中央将该文当作1974年第四号红头文件下达到县团级,老杜在编后语中说这篇“影响很大很坏的‘内参’稿是我1974年4月写的”,“我在‘农民记者’的传略中(对这篇文字)已作过自我批评,承认我直到那时,对‘文革’一套错误方针的认识还是很糊涂的。自己糊涂,又要急急忙忙写稿发稿,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是一条教训。这篇东西影响之坏,至今不少同志还记得,作为一种反面资料,我把它收集到书中来了。”

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老杜也有过短暂的清醒与冷静。虽然作驯服工具惯了,虽然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盲目性很大,但他有深入群众的传统作风,求实思想,对那些过分离谱的错误,也有所觉察,有所抵制。譬如1959年4月19日他彻夜写的那份万言书,如实反映广东省已陷入灾荒的困难局面,他认为三面红旗有错误,疾呼中央立刻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一封充满对党无限忠诚的实事求是的信件。然而此信被送到中央时,却正逢庐山会议反彭德怀,于是老杜成了广州的彭德怀,他的信立刻被当作反毛泽东的铁证,他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受到批斗。在广州,他被单独批斗了17次,最大的一次有6500人参加,最后被打成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了帽子,下放劳动。老杜成为新闻记者们的榜样,他的遭逢告诫所有记者,党内当时是不许记者独立思考的,不许记者说实话的。发生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不正常年代的老杜的这些错误,实在不好算作错误,那些错误,正是老杜对党忠心耿耿的具体表现,老杜的错误是我们党当时新闻工作的那种性质决定了的,正因为他是我们党当时一个极忠诚的新闻工作者,才自然犯了这些错误。

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那是1991年,我参加全国优秀新闻工



作者表彰会。报社让我顺便选择一个先进人物典型。我选好的典型是中央一家新闻单位的知名老记者。那天在和几位会议代表谈起我选择的典型,谁知一位同行听说我要写那位老记者,大不以为然,对这个先进典型嗤之以鼻:“此人身上没有一根骨头,是软体动物啊!”“一个风派,跟风跟得很紧,在任何政治气候下他都能如鱼得水:50年代末浮夸风,反右倾,他很积极;‘文革’大批判,他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他批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反了;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他又一篇接一篇地写报道。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写了多少混淆视听、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稿件?他宣扬的假话、空话、套话、大话太多了,这样的人,真该大书特书呢!”

听了这位同行一番话,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位同行的话也引起我的深思。在极左路线下,作为喉舌的新闻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文革”中,整整一代干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大队书记,几乎都曾成为走资派而受到批斗,制定宪法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活活整死;中国整整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哪个没有挨过批判?哪个没有违心地写过认罪书?哪个没有在被迫害中心灵淌过血?

在极左路线,尤其是“文革”这场惨绝人寰、空前绝后的民族大劫难中,新闻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助纣为虐,落井下石,助长了整个民族的疯狂!这是民族的悲剧,是国家的悲剧,何尝不是新闻界的悲剧!在那场民族灾难中,有多少记者违心地写作?其中不乏有人昧着良心在写作,这种违心的昧着良心写出的假大空的报道又有多少价值?在极左路线下写出假大空以至颠倒是非的报道,因此自然不能简单说成是记者的责任,因为记者是喉舌,是工具,喉舌是受大脑指挥的,工具是受人支配的,人拿着斧头砍了树,能把毁林的责任转嫁到斧头身上吗?

那么什么样的记者才算好记者?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作为喉舌,记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大脑”指挥。但当记者已经洞悉“大脑”的指令错了,那该怎么办?我们党那时给新闻工作规定的言行框框是,即使错了也要服从,大脑发出指令,喉舌不准抗拒。按照喉舌理论,服从,这才是最称职的记者,才是好记者。但那些在错误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记者,该怎么来评价?坚持



真理的记者称不称职？合不合格？算不算好记者？衡量记者是否合格是否优秀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在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中，老杜有顶住压力坚持真理的，也有头脑发热，跟着做了错事的。顶住了压力坚持真理，却违背了当时的喉舌标准；跟着运动走，发挥喉舌功能而做了错事的，难道应该值得肯定？功过是非，究竟该如何评说？

新闻界的功臣

老杜是新闻界的名人，我认为他对我国新闻事业贡献是很大的。当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老杜时任新华社总社国内部主任，他坚决主张立刻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这篇文章。他的意见得到国内部几位副主任和社领导的支持，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一字不动地播发了。接着，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要各省市分社记者采访各省省委书记、各大军区党委，几乎是强令省市和军区领导对这篇文章表态。结果最后是 27 个省市自治区和 11 个大军区的党委和主要领导表态。对老杜的这一做法，当时新华社总社内部个别领导有意见，认为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表态报道内容千篇一律无人愿读。老杜却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

粉碎“四人帮”后，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他以敏锐的目光，从北京市委 3000 多字的会议公报中发现了羞羞答答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文字，他和新华社国内部其他领导一起果断地将其中 200 字摘出来单发，经曾涛、穆青同志同意，终于发出轰动世界的消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粉碎“四人帮”后风靡全国的推动全局发展的三大工程：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老杜指挥的新华社国内各系统，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支持下，在新华社几位社长的领导下，一直不顾阻力，冲锋陷阵，成果丰硕，立下汗马功劳。老杜为此在 1978 年新华社总社群众性评奖中获一等奖第一名。

老杜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期间，那是光明日报的黄金时期。老杜的风格是抓典型。栾弗、蒋筑英、张华，一大批先进典型为光明日报撑起一片蔚蓝的天。那一段光明日报先进典型不断，批评

